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三期 ——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1d)

【自由论坛】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上)	任不寐
【艺术评论】	他们是否已被遗忘	景凯旋
【史海钩沉】	对舒赛 (王藕) 的讯问记录	舒 赛
【文献资料】	关于林彪“顶峰论”问题上毛泽东书	胡全林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自由论坛】

###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上)

• 任不寐 •

1966—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一场否定性的巴别塔事件。人类自以为神，并纠集种族在理性和意志的带领下通过合作建造通天塔，这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罕见。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理性的自负”之外，仍然拥有完全属于灾民社会的品质。一方面，它不是合作性或肯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是内战性或否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这一特征与中国的灾民理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革现象是中国无神论传统、特别是敌基督传统的政治后果：从纯粹信仰角度看，文革不过是长期背逆真理赢得的惩罚；从神学理性上看，文革乃是这种悖逆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与此相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文革是从历史深处出发的，而作为政治现象的文革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代三年文革不过是三百年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大典。

## ◇ 无神论文革理论研究述评

不仅仅由于北京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限制，也由于汉语思想传统本身的限制，三年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研究并未获得具有“两希”品质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令人尊敬的学术表现

乃是艰苦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而，这些材料至今并未构成文革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些材料大部分成为文学抒情、政治指控或道德指控的证据，而在西方，所谓文革研究乃是对这些材料的再整理，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仍然是罕见或不能使人满意的。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形成了至为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目前的文革研究主要仍然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吸取灵感，然而却完全过滤掉了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属灵品质；而一旦经过这种无神论处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文革研究使法国大革命白白发生了，路易十六再次被砍头，拿破仑再次称帝，而汤玛斯·潘恩的《人权论》再一次战胜了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1）。

由于中国的文学理性传统，1976年以后的文革研究首先进入文学抒情阶段。“伤痕文学”先后经历了“某些人是文革灾民”和“所有人都是受难者或所有人都是文革灾民”这样两个阶段。这个时期大约截止于1986年，邓时代的非毛政策半推半就地鼓励了伤痕文学对毛派力量的指控，而一旦指控逐渐涉及制度层面，特别是经过1989年政治危机，“伤痕文学”随着文革重新成为研究禁区而终止。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北京就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像的通知”，以控制反思文革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的时代“忏悔文学”粉墨登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种新观念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种观念分享了文革反思情绪。然而忏悔文学并没有从神学基础上展开，90年代另外两种思潮的对立撕裂了这种半途而废的文学忏悔。第一种思潮被称为新左派思潮，他们反过来从“文革民主”中看见了抵抗现实不公正的思想资源。另一派自称为自由派，他们通过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和英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强调文革民主乃是多数暴政，是对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权的粗暴践踏（2）。

1986年以后国内文革历史整理方面有了一定进展。然而，1986年以来的海内外文革研究，在理论上大致未能超越道德指控和苦难记忆的层面。这一点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所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档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3）。余赞成毛及所代表的党应该承担文革罪孽的主要责任：“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4）。200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北京“三味书屋”的一次演讲中总结说：西方对文革的研究超越了帝王将相史，他把西方的研究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第二种解释正相反，把文革的发动归因于纯粹的权力斗争；第三种观点居于前两者之间。（5）然而这三派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掌权者承担责任，罪的根据在纯粹世俗领域。

与此相关，问题进而涉及到文革与传统的关系，由此也产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相信，文革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文革乃是传统文化中的黑暗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爆炸性呈现。前者如林毓生、杜维明等海外儒家学者，他们持这种亲近传统的立场，他们更愿意把文革理解为对五四的反传统激进主义的回归。一些英语研究者支持这一观念。（6）这些分歧焦点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不同。如果不在“两希”文明的参照系之下，或者缺乏希伯来—圣经文化的介入，就无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物件化。换言之，相关评论无法拉开中西文化的距离，也无法分别厘定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空隙。

从经验理性上看，反传统的观点应该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正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所看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谈到，儒家的人性本善道德万能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法家的强权主义、墨家的平均主义、兵家的诡道等等，都在毛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身说法中，在文革的“以传统反传统”的逻辑中逐一呈现。（7）然而这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时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

不到超越文革精神的资源，他们又不愿意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寻找自由的根据，避免文革悲剧的力量就只剩下五四精神，只剩下“德赛二先生”；而这赤裸裸的“德赛二先生”正是引导法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近年对这种局限作出反应的著述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郅元宝的观点颇引人瞩目。郅在《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一文中谈到：反思历史不能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文革”研究应该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至少应该从“五四”开始——“五四”知识份子几乎一致反对或冷淡基督教，人被放到了神的位置；“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体”，结果文革研究只剩下道德论断。（8）不过郅仅仅把五四知识份子放在被告席上不完全公道。从法律上看，毛当然首先在被告席上；其次，五四以前的汉语主流思想一直是反基督教的，而梁启超在这之前就提出了“新人”概念（《少年中国说》），而这个“新人”概念一直是汉语人本思想的最高理想：新人不过是圣人、真人与立地成佛的近代语言。根本没有神，人可以成为神，这不是五四才开始有的东方信念。“文革”中的很多词语都体现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从来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命题，而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了。

我不完全否认新儒家对现代性的指控。然而，一方面，五四以来从西方吸取的“现代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本源；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非基思潮却仅仅在东方彻底掌握了民众和他们的精英，这种情况就只能在本土寻找答案，确定“差别原因”。共产主义幽灵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最为稳定的国家形式，必然因为这里存在它可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土壤。“有灾变无信仰”，是文革精神维系和泛滥的基本处境。

灾变社会为文革消除了世俗障碍。首先，灾民社会骚乱的机会成本较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在社会动乱中所失不多，却可能通过动乱获取身份变迁。计划经济进一步把人民搞得一贫如洗，从而使社会动员更为容易。人们没有财富和政治自由的荣耀，唯一可能获得荣耀方式就是“投身革命”。其次，灾民社会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多机会主义特征：文革抗议经过了灾民理性精致的算计：与最高权力或与人民权力合作可以极大降低政治风险。这一点使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区别开，在法国，拿破仑是革命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前提。文革并非完全是一场狂热的激情主义骚乱，无论是对掌权者还是民众，他们更可能是“政治巨人”、“文化李逵”和“激进愤青”面具下面精明的政治灾民。“道德理想国”如果不是逃避责任的谎言，就是故作小儿状的灾民神话。第三、灾民社会的普遍敌意为上面的政治合作规定了否定性方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否定成为自我荣耀或牟取利益的唯一路径。灾民的敌人意识一方面源于残酷的生存竞争（包括政治斗争），这种敌意只能通过进一步的你死我活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因普遍贫困和精神无聊导致了对不平等的极端敏感、不可遏制的仇恨，以及对打破现状追逐任何一点可能变化的热望。然而由于资源的绝对短缺，改变不是向内反省而是改变他人——改造社会的内在动机是重新分配邻居的财产、政治身份，并通过侮辱他人成为他人的上帝；或者为了成为他人的上帝必须侮辱、否定、指摘、消灭他人。

否定性的政治革命同样需要在精神世界自我合理化。假上帝为了否定性目标必须把自己想像为上帝，从而解脱任何内在约束或摆脱真上帝的主权以便为所欲为。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否定性意志完全锁定在内部，指向自我，但无神论将人从这种“捆绑”中释放出来；如撒但所鼓动的，人可以象神一样论断善恶。文革之所以获得了内在良心的援助，乃在于这种无神论自义，由于铲除了上帝这最根本和最后的约束，因否定神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人和一切。在这种否定中，每个自我得到了撒但给他们的应许：“可以象神一样”。当然，这种狂妄必然得到了象撒但一样的惩罚：短暂的空中荣耀以后是突然的坠落和永远的羞辱。

无论从灾变论还是从信仰角度看，文革因此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1966年—1968年的三年文革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灾民理性传统和敌基督传统；而清晰可见的，包括文革的动机和目标、动员方式、内战策略、否定性专案等等，都从十七世纪初到今天的三百年中的历

次非基运动中表现出来，三年文革不过是这三百年文革的现代总结。一方面，三百年文革为三年文革提供了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三百年文革由于否定了上帝使三年文革中的非上帝暴乱或自我惩罚终于成为可能。这三百年非上帝事业是这样逐渐发展的：从明末清初300年的禁教和教案，经20世纪前50年的义和团运动、非基运动、到1949以后的三自运动、控诉运动、反右派、文革，直至今天逼迫家庭教会的禁教政策，中国三百年来一直存在一种针对基督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构成了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文化基础和宗教报应。这三百年文革历史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徒3：14）。毛泽东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非上帝或凶手的代表。文革乃是大大小小的非上帝和凶手互相践踏的内战史。而这一切否定性罪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第一个否定：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 从1615年到1949年

回顾汉语思想反基督教历史并不能给文革的起源提供直接的证据。问题在于，一方面，汉语思想是以文革的经典方式在反基督，或者说，中国人在反对基督教的三百年历史中，奠定了三年文革所有的“指摘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敌基督历史扫除了文革罪恶行径最后的精神阻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权者及其仆从恰恰为了这一目标而加倍逼迫教会。

1553年（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9）

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爱德生，福音在中国逐渐扎根成长。然而，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在弱者身上表现权威意志，这切合灾民理性之精要。“景教”的覆没（845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灌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和皇帝一起发动了第一场针对教会的文化革命。1615年，沈灌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5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及政治对手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因此是外来敌人；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精神权威，否定领袖和精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传教士个人生活堕落，是人民的敌人；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灌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份子的回应。沈灌胜利了，1617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灌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第一个敌基督的朝代被满人彻底剿灭。（10）

沈灌的系列文章后辑为《破邪集》，于1639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份子奉为宝典。1624年4月19日，沈灌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659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 Dunne, 1962）这位姚文元加王洪文式的人物首先得到了一位张春桥式的知识份子吴明烜的支持。吴明烜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烜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林彪—江青式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鳌拜。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1664年9月15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鳌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这些做法直接被后来的现代国家复制在各类“反动分子”身上。

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1724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19世纪晚期，“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7年”。“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60—90年代这30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11）在清朝众多殉教的信徒中，一位叫林昭（1817—1858，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20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林昭同样死于无神论专政。——审判第一位林昭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显然是当地知识份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像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份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这场文革是灾难性的。义和团和官员残杀231个洋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1899年春夏间，义和团“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索之案，直与盗匪无异。”（12）

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普通中国人死于这场动乱。教会方面的损失不完全统计：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东正教至少222位传道人殉道，平信徒罹难者不可数记。（13）

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接近文革：伟大领袖慈禧“错误地领导并发动了这种动乱”以转移政治危机，而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以后，又出卖了这些农民红卫兵。然而，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知识份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知识份子在“庚子事变”这场动乱中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天朝还来不及清算这些知识精英就崩溃了，知识份子的傲慢在天朝的背影中继续无限膨胀。

1919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份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份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份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精英，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份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于是以“非基运动”命名第三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那些批评义和团为“拳匪”的进步知识份子，现在开始将“拳匪”的未尽事业发扬光大。非基运动为后来的三年文革提供了定型了的语言习惯和叙事方式。“非基运动”也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份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赶上帝之后，自身不断沦为恣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精英被从中释放出来，并逐渐掌握了国家成为知识份子的新主人。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德（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

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覆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

“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这些大字报与三年文革中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如出一辙：“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14）

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15〕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曾、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中国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利己主义思潮。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份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然而这些知识份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以来，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1949年以后，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针对教会余民、所有知识份子和党内敌人以及邻居的最后一场文革不可避免。三百年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对后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负责——中国人民及其精英自己争取到了文革式的全面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 ◇ 从1949年到1969年

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份子和民众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并占有教会资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份子也被消灭了。不过知识份子在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R. J. Rummel教授称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居美学者丁抒相信文革死亡人数为两百万人。（16）“文革”后中国知识份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1949年以后的反基督文革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58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当局利用三自教会消灭了独立的宗教信仰；最后三自教会也被铲除。1958年到1969年为第二阶段，当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运动”，表面彻底消灭了基督信仰；最后，被利用完毕的红卫兵群众同样被权力遗弃。三年文革（1966—1969）发生在这一阶段后期——当真神被弃绝之后，假神以最恬不知耻的方式隆重登场。不过时间不是很久，这位假神、这位万岁在无神论者特有的死亡恐惧中去世，而他的余党，包括自己的妻子，被这个无神论国家关进监狱，逐一悲惨死去。在这20年的短暂岁月里，围绕逼迫基督教展开了五条历史线索：第一、迫害信仰愈演愈烈；第二、与此同时个人迷信或对毛的假神崇拜愈演愈烈，相应的，大跃进和三年文革是两次逼迫信仰的高潮，因此也是偶像崇拜的高潮；第三、所有与掌权者联合逼迫教会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断被掌权者使用之后所遗弃或迫害，掌权者最后也被“历史”抛弃；第四、在每次大规模逼迫之后都是大规模的灾难，第一次是三年大饥荒，第二次是文革大动乱。第五、基督信仰在逼迫中不断民间化，1969年以后，家庭教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复兴。

无神论专政不仅铲除了教会，也铲除了教会史。由于意识形态的恐怖管制，中国当代大陆教会史几乎一篇空白。然而“神有预备”，在海峡对岸，一位叫赵天恩（Jonathan Chao, Ph.D）的基督教学者用了毕生的精力保留了这段历史。赵天恩博士也许是为这项事业而出世的，也在完成这个事业之后猝然离去。（17）

按赵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中的记载，1949年中国大陆基督徒应在150万人左右。（18）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歌林多后书3：17）1949年以前，中国对教会的逼迫不是赶尽杀绝式的；50年代以前，大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空间。至今，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怀念那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时代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代，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是针对他国事务的，对本国君王只能通过打比方（寓言）进行谏劝。中古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只能自由思想王政以外的问题，或者按王的意思思想、最低不能直接否定假神的意志。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现独立知识份子的时代，梁启超和胡适，王国维和鲁迅，都是这个时代慷慨给予中国的。然而，1949年结束了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消灭自由的历史恰恰同样是从消灭信仰自由开始的。

1950年7月28日，官方喉舌《天风》刊登了三自革新宣言，假神对真神的战争正式揭开序幕。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副总理、中国当代杰出的知识份子代表郭沫若先生《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同时，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对教会的抄家、



游街和打砸抢、大鸣大放开始，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对教会的第一场文革全面开始。1951年2月12日，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收（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文、理、法科各系并入北大；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等大学先后于1951年内由政府接办，200多所教会中学和1700多所教会小学也由政府接办。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亦无例外。（18）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内知识份子的领袖（如陆定一等）和基督教界内的领袖人物（如吴耀宗等）启动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的“控诉运动”。195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社论。党开始通过三自教会发动群众迫害信徒，并在三自运动中对拒绝参加御用教会的信徒强迫政治学习。另一方面，党开始垄断神学教育和出版业。与此同时，到1952年底，3500多外国传教士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中国。

三自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可悲的是，整个国家，也就是后来被逐渐全部投入文革的人民及各类精英，即使不是赞助也旁观了这场灾难。这也意味着，第二场、第三场文革的到来不可避免。下列资料多少显示了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基督教人士遭害的况惨：至少56,000多人遭监禁，被处决的信徒高达10,690人；更多受害者无法统计。（19）遗憾的是，在90年代以来海内外文化界令人尊敬地公布文革受害者名单、特别是名人名单的时候，没有一位信徒，更没有教会知名人士。而事实上，在“文革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甚至是施害者的日子了，教会领袖就遭遇了文革灾祸。在胡风 and 右派分子罹难之前，1952年当局秘密逮捕了“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倪柝生，1956年6月21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倪柝生有期徒刑15年。“基督徒聚会处”各地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信徒皆被以“倪柝生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1955年8月7日夜，北京逮捕了“基督教会堂”的王明道夫妇及18位信徒，9月14日，广州“大马站聚会所”林献羔等人被捕，同样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罪名被捕的信徒遍及全国。1958年4月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妻子被判刑18年。11月24日，林献羔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与此同时，北京“福音堂”的袁相忱北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在第一次文革中，被捕的著名教会人士还包括上海的谢模善，厦门的袁迪贲等。有罗马背景的天主教界更不能幸免。1953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1955年上海主教龚品梅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以文革方式“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20）

对生命的杀戮总是伴随着掠夺财产和剥夺自由。文革以后退还教会财产表明，当局承认这是一场国家领导的无视财产权关系和国际准则的违宪抢劫行动。这场文革不仅对教会是一场灾难，对整个国家更是一场灾难：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受到重挫；而在政治逼迫中，在社会动乱和大饥荒中，中国人失去了欧洲人历史上拥有的最后“逃城”：可以到与政权分治的教会机构那里寻求庇护和救助。随后发生的大饥荒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20、30年代，中国的历次大饥荒中，教会组织扮演了最重要的赈灾角色。

党通过第一场文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将精神生活绝对地置于权力之下，在这一计划中，信仰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难以控制并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因此，摧毁信仰自由是消灭一切自由的前提。有论者称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看来党比这些知识份子更清楚什么是第一自由或自由的基础。党取得了初步胜利，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八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党通过这个机构成为中国基督徒的凯撒。党从教会的废墟出发，开始征服整个国家的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二场文革开始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成为这场文革的政治标签。

第一场文革中的打手三自教会此时成为被打的对象，它与中国55万知识份子一起沦为帝

国的政治渣滓。1957年8月，三自教会内部开展反右斗争，各地大部分教会头面人物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劳动改造”。而大约2230多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被处决；（21）数字还不包括随后以“反革命分子”为名受杀害的教会人士。同时，三自教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多传道人转业从事劳动生产。而大量的三自教会开始合并，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宗教的影响。到1958年，党利用三自完全摧毁了民间教会之后，又利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三自教会。1949年，中国有2万间教会及福音堂，1958年不到100间。同时，神学院由30几间压缩到2间。其他出版社、教会医院、教会大、中、小学校及其他福音机构。未来到1959年就早已停顿了。（22）

惩罚马上临到，在第二场文革中变本加厉地硬着颈项的中国法老们，迎面撞在三年大饥荒的“十灾”之中。这场悲剧包含着这样一种悲剧，如此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死亡，至今仍然搞不清楚死难者人数和第一责任者。不过目前通过官方解密的材料可以接受的数位和结论是：至少三千万中国人饿死，而当局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有人甚至根据这些材料推出“准确数目该是41655000人。（23）值得参考的数字是：仅四川省，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24）一位美国学者在分析相关材料后总结说：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is famine was the worst of modern times in terms of the human suffering and excess deaths. Yet there has been surprisingly littl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famine.（25）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饥荒源于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基本指导精神乃是以人为神，相信人定胜天。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首先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1958年底，决策者把预计粮食产量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其次，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人为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局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职工人数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26）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与此同时，无偿调拨农业劳力物力。1958年秋收未完，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同时减少粮食播种面积。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最后、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而这一切的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乃基于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27）面对十灾，毛这位法老的反应与埃及法老的反应如出一辙：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4月24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指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28）

三年大饥荒中法老没有任何悔改，整个党没有悔改，整个国家没有悔改——而且在危机中准备杀人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这意味着，三年大饥荒将毫厘不爽地迎来三年文革“击杀长子”的最后惩罚——整整一代青年“兴起”了，却最后倒闭在“广阔天地”的旷野之中。第三场文革、三百年文革最后（？）的血腥大典、将自己的儿女经火于摩洛的偶像祭坛，已经在红海洋的火焰中被高高举起。

最后的演出之前必须清除宗教最后的残余或羁绊。大跃进期间教会基本瘫痪，聚会也基本

被迫停止。仅存的一些主日崇拜中，牧者被严密监视，人身自由被限制，讲章内容受到审查，并要求曲解圣经为政治服务。如当局鼓励孤立地传讲罗马书13章1—7节，彼得前书2章13—17节，因为这些经文强调信徒对掌权者的顺从；此外绝对禁止崇拜中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资讯。1960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要求教牧人员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中成为“红色牧师”、“红色神父”。〔29〕60年以后，幸存的三自会领袖成党的反美工具，他们被组织起来编辑史料全面歪曲中国教会的历史。在“文化革命”前夕，御用教会编写了《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两份内部大批判材料，对中国传教史进行了最后的政治清算。

在假神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前，必须在人们心灵中彻底根除对基督的最后一点感情。1963年中共突然加大了无神论教育宣传，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1963年5月9日《人民日报》向中国读者推荐苏联作家写的《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等等。1964年4月2日，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撰文《破除宗教迷信问题》，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迷信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事实上基督教对文化大革命和非上帝的事业存在严重危害性。1965年四清运动中，共产党积极发动信徒批判宗教，强迫信徒公开自我批判，毁坏宗教设施、经书等。当时宗教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宗教进行组织上搞垮、思想上搞臭，进而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30〕在信仰上，当局正为文革进一步开辟道路。在毁灭信仰的同时，巴别旷野的金牛犊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据1967年底统计，全国共印发3亿5千万册。〔31〕1965年全国纷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由于恐惧真理之光复燃，1972年4月当局从俄文转译出版了法国无神论者撰写的《袖珍神学》一书，翌年出了第二版，以巩固假神崇拜在精神世界的表面胜利。今天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深受此书之害。

假神已经被人民膏抹，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三场文革的暴风骤雨。三年文革以消灭宗教为起点，以把毛泽东崇拜为神为中点，而以红卫兵被假神抛弃结局。

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是文革的开业典礼，而消灭宗教正是“破四旧”的目的之一；在这里，红卫兵取代了三自会成为撒旦的鹰犬。首先，连统战部控制的“宗教事务局”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被撤销。其次，1969年8月《红旗》杂志发文重申20年代“非基运动”的纲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压迫、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它束缚了把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反抗。科学共产主义和宗教是对立的，为争取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和‘在地球上建立基督之国’是水火不相容的”。最后是斩草除根式的对教会的大逼迫：绝大部分的宗教设施被毁灭、教堂被红卫兵占据，有的改为工厂、仓库和干部办公室、甚至猪圈和畜棚等；圣经和福音书籍被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焚烧，而聚会被绝对禁止；很多信徒（无论官方或民间）被逼迫、抄家、示众、折磨、体罚、监禁和杀害。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三年文革期间基督徒死难方面的准确数字。“资料显示，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沿海地区，或在内陆省份，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或多或少，都因他们的信仰而遭遇残酷的批斗，身、心、灵皆严重受创，至今仍心有余悸”。〔32〕这场大逼迫或许可通过一些幸存者的回忆见证一斑：

一位女信徒和丈夫被红卫兵绑起来，他们的头发被剃光。红卫兵用枪口对准他们二人的胸膛，而四个女儿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板上，问他们信耶稣还是共产党，孩子们回答要信耶稣，便将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仆倒下来。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而亡……〔33〕

英国研究者 Anthony Lambert 感慨：“在现代史上，除了北韩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差不多

是唯一在一段时间内关闭全国教堂的国家，以拆堂、焚书、殴打、杀害等方式，全面消灭国内的宗教，置教会于死地，迫使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34〕

就在真神被凌辱的同时，就在红卫兵用大锤砸扁信徒的女儿头颅的同时，假神出场了，而手沾鲜血的中国青年潮水般在午门外的刑场上举行偶像崇拜大典。三年文革中，毛泽东的像取代耶稣和十字架挂在教堂里。对毛的个人崇拜无以附加，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中国人民大大救星等等恬不知耻的口号成为民族语文，毛成为偶像、成为绝对真理，成为神。而一切罪恶，都是从假神崇拜中被合理化，并从那里疯狂地扑向全社会和每一个家庭。这就是文革的无神论精神：“以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取代中国现存的宗教，可说是文革的一个主要目标”。〔35〕

然而假神不是神，它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和说谎的。文革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已经成为文革研究的主要项目。天安门的疯狂刚刚落幕，那些不可一世地占领教堂凌辱信徒的红卫兵群众，也被利用之后流放到“广阔天地”之中。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8000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36〕进入70年代以后，这些被遗弃的政治孤儿开始大规模抗争，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以西双版纳为焦点抛弃了假神。然而，至今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仍有数十万人。〔37〕在这场悲剧中，蹂躏信徒女儿的女神遭遇了悲惨的蹂躏。“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38〕

红卫兵和知青的命运是令人同情的大悲剧，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场偶像崇拜的大悲剧：毛和革命是大偶像，自己是小偶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的伤痕文化时代甚至到今天，没有看到一篇专门忏悔自己逼迫信仰的反省文章；他们仍然认为，也许手段过激，但破除迷信仍然是对的。同样遗憾的是，今天的一些文革研究者就是当年焚烧圣经的人，也是今天仍然谈信仰而变色的人。

偶像毕竟不是神的最大确据在这个地方：救星和万万岁都死了，他的追随者也凄惨中打发余生；而教会在逼迫中逐渐复兴。1969年以后，公开教会消失了，家庭教会反而逐渐兴旺。“到了文革后期，家庭教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信主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尤以浙江、河南、山东、福建等省的家庭教会，最为兴旺”。〔39〕文革中被宣布为“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温州，80年代后奇迹般地涌出几十万信徒，并持续骤增。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教会，差传打发的传道人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三年文革和三百年文革的历史总结，早已经启示在圣经里

---

关于文革大批判和阶级斗争：“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诗73：6—9）

关于无神论和为所欲为：“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诗篇10：4）

关于大跃进和文革崇拜：“有乾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乾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耶利米书50：38）

关于毛派力量的毁灭和红卫兵的命运：“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以赛亚书 25：11B）；“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 30：3）。“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抱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以赛亚书 45：16）“事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诗篇 106：36）。“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耶利米书 10：8）

关于文革的结束和“伤痕”文学（唉哼文学）：“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以赛亚书 41：29）“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耶利米书 51：52）。

所有教训写在最大的戒命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申命记 5：8）“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撒迦利亚 13：2）

（未完待续）

~~~~~

## 【艺术评论】

他们是否已被遗忘

• 景凯旋 •

最近一个时期，徐唯辛先生的画作《历史中国众生相》正在北京一个美术馆展出。这个画展与众不同，属于对历史的现象学还原，63幅巨幅黑白油画，再现了三十多年前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叱咤风云的领袖和名人，也有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曾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如今画家用相同的尺幅和色调，将这些个体并置于同一时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正如画家自己所说：“能用个体的方式为一个时代立像，这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最好体现。”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些集体画像的，感谢那些有心的观众，把这些画像贴在网，使它们得以传播。当年的星星画展，也曾给我带来过类似冲击。我想像这些画像在展馆里按音序排列，好像一首漂浮在空中的黑白旋律，奏出一个逝去年代的癫狂、苦难和无解。他们的目光穿过时空，仿佛是在追问，发生的这一切意义何在？然而，没有答案。历史已然远去，记忆也在泯灭。今天的人们沉溺在物欲的漩涡中，再一次被时代裹挟着向前。难道时间真的会洗刷一切，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过去，永远是活在当下？我们被告知应当遗忘，然后就会感到幸福，于是我们真的就集体失忆了。

有个伟人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可画家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物质去寻求心理的平衡，那只是出于可怜的无力感。拒绝记忆，就是拒绝对回归人性良知的呼唤。这样的民族不会幸福，历史的灾难将没有任何补偿。

油画中一些依然健在的人也出现在画展上，站在自己的画前留影。无论是当年的迫害者，还是受害者，都已经垂垂老矣。时间是最不公平的，同等地惩罚了他们。画家画下王晶尧老人，颇有深意。41年前，他的妻子卞仲耘校长死于自己学生的棍棒皮带下，他在第二天用相机把事件的细节拍下来，多年来一直在申诉不已，要讨个公道。而就在今年9月，卞仲耘老师的学校迎来校庆，展出的却是当年著名的献红袖章的照片。徐唯辛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王晶尧老人，这样说：“在他们巨大的画像前，我拥抱了这个受尽苦难却意志坚强的80岁老人，为心

中涌动的悲悯和歉疚——我们真的没帮到他什么！”

凝望着这些画像的眼睛，我突然泪流满面。平时看惯了各色人等的目光，还从未有过如此具体而鲜活的感觉。意志坚强又有什么用，假如我们选择遗忘，让真相永远湮没？我们从过去的苦难中挣脱出来，但却一无所获，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发生的这一切意义何在。历史变成了天问，那些静静地悬挂在壁上的画像，就像是在证实北岛的诗句：“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但是，假如沉默真的是我们唯一的权利，假如我们彻底失去了言说的需求和勇气，诗人的诗句便显得太美，画家的画像也显得太实。我们哪里有资格回味历史，我们不过是一群现代世界的猢猻罢了，只知在当下痛并快乐着。

我一直以为今天的人只会娱乐和挣钱，艺术家们只会莺歌燕舞。但徐唯辛先生却消除了我的成见。他的画笔恢复了个体的历史存在，唤起我们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他将那些制造历史的人物和承受历史的人物并置在一起，使历史获得一种阐释。所以徐唯辛先生真的不必为没能帮到王晶尧老人而感到歉疚，他的画作已经把老人的苦难变成了一种意义，让我们在往事的追寻中共同分担人生经验，而艺术伟大的意义终将把我们 from 历史的无意义中拯救出来。

~~~~~  
【史海钩沉】

对舒赛（王藕）的讯问记录

• 舒 赛 •

〔注：舒赛，又名王藕，1917年生于湖北江陵，1938年入党。1966年12月初在北京全城张贴18份标题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林彪的大字报，于1966年12月2日晚报被抓。4年半后，被迫害致死。〕

北京市公安局  
被审问人：王藕（女）

◇ 1966年12月8日（注1），自0时开始至5时20分结束（入狱当夜）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叫王藕，你们还不知道？  
问：少说废话！问你什么你讲什么。还有什么名字？  
答：老名叫舒赛，在家名叫祝成龙，以后又叫过祝况、司翹，文化大革命后叫王咏。  
问：你多大岁数？  
答：四十九周岁。  
问：你住在哪儿？  
答：住大佛寺东街19号。你们把我弄来的，你们不知道？  
问：这些问题你不耐心讲，你讲你的问题。  
答：六〇年让我坐牢（注2），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叫我坐牢，我仍不知道为什么？  
问：讲你文化大革命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答：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开展，我发现很多打人的现象，我很担心，另外我看到很多批判刘

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国务院接待室的院里，说《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毒草。我认为《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这些文章是很好的。我还看到给陈毅写的大字报，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给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老首长写的大字报，还有打倒罗瑞卿的大字报，就是没有林彪的大字报。我就用金粉给林彪写了个红报〔注3〕。

问：你的红报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答：我从9月份开始写。

问：都贴到哪儿了？

答：贴王府井百货大楼南面一张。是12月2日。我11月底就写好了。

问：你按顺序讲。

答：接着贴市委一张。第三张贴在府右街，又贴西单菜市场一张，中组部门口一张。我出了复兴门，在国务院宿舍门口贴一张，又到石景山钢铁厂贴两张。从石景山到颐和园门口贴一张，然后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门口贴两张，再到西直门里贴一张，从西直门到府右街国务院接待室门上贴一张，从这里就回家了。12月3日我又到东四人民市场门口贴了两张，还贴北京火车站一张，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一张，大楼往东南的拐弯处一张。家里留了一张作纪念。

问：你一共贴了多少？

答：十八张。

问：你怎么带出去的？用什么贴的？

答：我卷好装在兜里挂在自行车把上，左边车把上布兜里装着一个盛装糊的钢精锅。

问：十九张的内容一样吗？

答：全一样。

问：你讲你红报的内容针对的什么？

答：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我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

问：你写的“残害忠贞”是怎么回事？

答：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说，这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保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那一套。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了，我想不通。

问：还有什么？

答：还有陆定一、周扬，现在把他们都打倒了。林彪讲大民主，我没点名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把我关进牢。

问：“残害忠贞”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

答：我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学生的头脑简单，林彪大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就大反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和华北局，还要“一反到底”。我认为我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问：你还有什么想法？

答：我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有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人批判。

问：你对林副统帅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答：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

问：你的红报往那儿送过？

答：我觉得你问得太宽了。

问：你的活动应该讲清楚。

答：虽然党这么多年不承认我，可是我得有党的原则，你们，审问我和组织的关系不行。

问：你不要在这里这样狡辩，你应该尊重事实。

答：你不能审查我和组织的关系。我还没把自己降到一个群众的地步。组织上不承认我，是组织的事。

问：你要是想解决问题就应当把问题交待清楚。

答：在法庭上我不谈我和党的关系。

问：你都和哪些人有来往？

答：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做的事，没有别人给我出主意。

问：你这么不老实！你都接触过哪些中央领导同志？

答：我没接触过。即使接触过你们这样问也不应当。我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党的原则。

审问人：你现在不交待，回去考虑去！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但拒绝按指纹。）

◇ 1966年12月8日，自15时55分开始至17时40分结束

问：你还是把该讲的问题讲一下。

答：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合常规，缺乏重点。林彪讲“读毛主席（写）的书”，这句话不符合一般的中国文法。还有什么“活的思想”，人的思想本来就是活的。我试着复写了两份批判材料。

问：你写林彪是“黑帮头子”，是什么时候写的？

答：可能是第一份上，是7月份开始写的，写到9月中旬就写红报了。

问：你写的材料发出没有？

答：我认为批判得不深不透。文化大革命号召大民主，为什么我写了几张红报，就把我抓到这里来？

问：大民主是有个限度的，你超过了大民主的限度。

答：我复写的东西还没拿出来，红报上也没点林彪的名。大街上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完全是攻击，为什么我就得坐牢？

问：你不要在这些方面纠缠，我问你的问题引不起你说这些话。

答：我认为即使我给林彪贴大字报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找我谈话。

审问人：你不要在这些方面纠缠，还是谈具体问题，你不谈问题再回去考虑去！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谈的相符，但有遗漏的要语。”拒绝按指纹。）

◇ 1966年12月10日，自8时40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入狱第三天）

问：你讲讲过去对林彪同志都采用过什么方法攻击的？

答：文革开始后，我看林彪要搞资产阶级篡权，还有人服从他，跟着他跑。我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卫毛主席。

问：毛主席是支持林彪的，林彪同志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你的矛头指向谁很清楚。

答：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毛主席在身边，这我知道、我认为毛主席受了林彪的蒙蔽。我贴林彪的大字报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我在国务院大墙上看见清华大学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字报写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我到清华去贴大字报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我贴出去红报很可能引起辩论和武斗，可能回不来。我在2号给亲属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果我死了，叫他把我的尸体和我母亲的坟埋在一起。死不了，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也清楚。我写成红报，这样可以使看的人多，可林彪分子撕的也快。我贴林彪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问：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答：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

答：你这样讲是你在犯罪，只有美蒋反动派才全专我的政。

问：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

答：中国共产党对我决不会这样，只有个别混进党内的内奸分子才会对我这样。



问：你不要胡言乱语！

答：我还要讲几个问题，枪毙我可以，送我劳动教养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我不去，去了我也不干。这是我对处理我的意见。

问：你讲这个干什么，你应当先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你过去都干过什么？

答：除了捍卫党和毛主席的事以外，别的没干过。

问：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你先交待清楚。

答：“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任何对我的诬蔑，我都不怕。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是在继续向党进攻，诬蔑党。

答：你这是对我诬蔑，你不配作共产党。

问：我们要告诉你，在人民政府的法庭上，你可以交代你的反动思想，但是不准你公开地攻击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如果你不听政府的劝告，你要自食其果的！

答：我坚持党的立场。

问：你的气焰太嚣张了，你要自量些。你要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你，到处找你，把你搞到这里来是便宜了你。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动立场了。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林彪的错误言论，我的看法全讲了。我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问：你这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反对党和政府。

答：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你在这里只有老实认罪！

答：你的立场很明显，如果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问：你不要这样嚣张，人民政府有他的法律，你这样闹，我们不怕。

答：不怕？！我给林彪贴了几张红报，为什么那么快就撕掉？为什么把我弄来坐牢？为什么给刘主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就没有人管？

问：你应该改变你的立场！

答：只有林彪才应该改变立场！

问：不准你这样诬蔑林彪同志。你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你给哪儿写过信？

答：这个你问不着，我没有回答的必要。你让我叛党不行。

问：你早就叛党了，中国共产党早就开除了你！

答：党在某个时候做出错误决定是有的。我有我的理想，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问：你这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没有权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答：真正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你不敢惹，还当帮凶。

问：这些都给你记下来。

答：记下来我不怕，连林彪是反革命我都敢说，还怕什么。

问：你为什么贴大字报不敢用王藕这个名字？

答：我改名“王咏”是到派出所登记了的。言字旁表示我要用语言揭露林彪，永是永保江山万代红。今天我反对林彪个人吃亏，是不让党吃亏。林彪对毛主席的著作背得很熟，实际上他是反毛主席的。

问：看来你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了！

答：“见上帝”这个词对我不适用。只有跟着林彪跑的人，才是渺小的人。

问：你交待你文革以来都往哪儿送过东西？

答：这个你没权利问。

问：我们当然有权利问。

答：林彪要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他违背人民利益，将来要死的，人民会起来消灭他。我为了捍卫毛主席，可以早死一步。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但拒绝按指纹。）

◇ 1966年12月10日，自15时2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你对林彪同志不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在东北（注4），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受尊敬的。我感到林彪比较突出个人的威信，不够谦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够。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四野”的入城式，是关系到世界的大事。骑兵比步兵快，这连小孩都知道。结果入城时骑兵走在步兵的前面，整个队伍稀稀拉拉。这件事林彪有责任。在中南，林彪包庇重用变节分子，“三反”中使一些党员受到打击。

问：“三反”中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答：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受到×××的打击。五三年我到北京之后，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反映来反映去，我坐到牢里来了（见注2）。我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忠心耿耿地工作的。现在我是没有党籍的党员，我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问：你不要诬蔑共产党，你这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

答：你这是林彪分子的立场。

问：我们就是林彪同志的立场，林彪同志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毛主席的立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的副统帅，不准你诬蔑林副统帅！

答：你让我说完，嗓门儿高没用。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来说明我批判林彪有哪些不对？我再三说过，只要你们有道理，我会虚心听取，可你们偏偏回避。

问：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这是你的新罪行，这样下去你没有好下场。

答：任何威胁对我都没有用处，空扣帽子也没用！你们为什么回避我的问题？

问：你不要回避问你的问题。

答：我毫不回避，哪个问题该讲，哪个问题不该讲，我已经讲清楚了。

问：你这种态度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答：我有个建议，你们是不是专案组负责人？如果不是，请你们最高负责人来和我辩论。

问：有什么辩论的，你犯罪了，今天是叫你交待问题。

答：审讯我这是你们犯罪。

问：我们代表人民政府专你的政，代表中国共产党审讯你！

答：你们代表林彪分子审讯我。

问：你态度太嚣张了，不交待你回去！

◇ 1967年12月5日，自16时1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一年以后）

问：最近你思想上考虑通了吗？

答：依然如故。

问：你还是不认罪？

答：我是不可能认罪的。

问：你不认罪，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答：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注5），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泥坑越陷越深。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怕！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这么嚣张，我们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你们这里就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就是现行反革命！

答：这是你说的，事实将会证明。

问：看来你是想当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答：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问：你这样胡闹下去不会有好下场！

答：你们这样做太过份了，即使你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对我这样也过份了！你今天找我要谈什么？

问：看你有没有转变？

答：我是不会变的，因为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我忠于马列主义。

问：（以下空白）

（以下是舒赛的妹妹所述——

以上是我们从当时所见到的全部（预审记录）中所作的摘录。后来姐姐被转移到山西，据同狱的难友们讲，对她还有过拷问，但未留下记录。

1971年5月24日，姐姐不堪折磨，死于山西隰县。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叛逃，亡于蒙古温都尔汗。

当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原北京市公安局取回了一袋破烂不堪的姐姐遗物，从中发现一绺她的头发和手指甲，她留下这两样“遗物”令人百思不解。当我们了解了姐姐在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又未能找到她的遗骨时，才明白它们的含义。姐姐自知她死后可能尸骨无存，故特意将这两样体肤之物留给她的亲人，并寓意她所遭受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1987年，姐姐生前的两桩冤案（“无理取闹”和“反林彪”）完全彻底地平反了，中央城建部为她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们将那绺遗发放入了骨灰盒中。）

（注1）1966年12月7日晚，舒赛被拘留，第二年4月11日才补办逮捕手续。

（注2）舒赛在50年代因反对党内个别领导人的不正之风，顶风坚持上诉，被有关方面以“无理取闹”罪名先后于1958年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60年开除公职，未经公安部门批准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1962年因病，经保外就医，提前释放，成为北京市的无业市民。此案经我们一再申诉，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86年，在中纪委的支持下，有关部门才为她彻底平反昭雪。

（注3）舒赛在10月底曾张贴过6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因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后来，她改为用金粉写于红纸上，故称“红报”。

（注4）解放前夕，舒赛在东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底调入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随军入关，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翌年，南下武汉后转业。

（注5）舒赛在北京监狱被强行戴上脚镣手拷。1969年10月，林彪发出各战的《一号通令》后，北京的大批未判决犯向山西转移时，她是唯一戴脚镣手铐的女犯。她经常在牢房活动手臂擦拭脚镣，那副脚镣被擦得油光铮亮。

~~~~~

## 【文献资料】

关于林彪“顶峰论”问题上毛泽东书

• 胡全林 •

## 政治宣言

为真正的人民——这个人民不是政治招牌，而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为人民的红色祖国；为人民的真正领袖毛主席而战！

最敬爱的主席：

您老人家好！我这次写信给您，主要是就林彪副主席最近的指示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指示的精神要点是：打倒“洋”字，大立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指示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它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彻底铲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造成的洋妆思想和民族自卑感，这对我国人民来说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您老人家的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是反帝反修反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国全党全军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但是，林副主席在具体的论述中，有些说法我却另有看法，现在简单摘引几句加以说明（文字上恐有出入，因我看不到文件，只是听领导上读一遍）。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打倒了，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它的必然结论是，《资本论》已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才是理论的基本阵地。林副主席又说：“毛主席的话一句超过一万句”（重点是我加的）。

我就上面的几句话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马列主义会因地理上的远近而影响其对革命的指导作用吗？照指示所说，那实质上就是否定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您的话），否定了马列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南；事实上，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了您老人家的思想（我认为您老人家的思想是马列主义中一个组成部份，这里为了便于论述，所以特地加以区别）对世界革命的重大的指导作用。因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离中国比欧洲离中国更远。总之，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

二、因为马恩列斯的“书太多”“读不完”而可以少读和不读吗？“书太多”会影响其革命的指导作用吗？照此说法，马恩列斯为了阐明和发展马列主义而写了许多书，倒成了一个错误了。如果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中国四十年前的革命和学习，那么，中国也就不会有马列主义，也不可能有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有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如《资本论》中阐述的某些原理）会有时间性吗？就是说，过了几十年或几百年，这些基本原理都过时了，不适用了。照此说法，实际上也就否认了马列主义，否认了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科学，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否认了“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子子孙孙，千秋万代传下去”（《解放军报》六六年元旦社论）这样一个广大革命人民的心愿。我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虽已打倒，但《资本论》中的某些革命原理却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决不能打倒。

四、我认为，把您老人家和马恩列斯进行机械地比高低，和放到天平上去称，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五、“一句超过一万句”（报刊社论中原是“一句顶一万句”，林副主席进一步发展，把“顶”字发展为“超过”二字），试问：“超过”谁的“一万句”？是人民群众吗？是赫鲁晓夫吗？还是林副主席自己？我想，前后二者都不可能，您老人家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您的话），因为您老人家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是最尊重群众的，是最谦逊的人，至于第二种，则根本不能相比，因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正如斯大林所说，彼得大帝不能和列宁相比一样。总之，我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这种说法是好笑的。

六、打倒洋奴思想，大破洋框框，洋教条，树立民族自尊心，这和崇拜与信仰马列主义应该是两回事。如果在“破洋”的口号下连马列主义也列为破的范围之内，这就大错特错了。笼统的排外主义是反动的，这种思想会阻碍革命真理的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宝贵财富。这句话也就会成了空话。

七、就从我摘引的几句话来看，林副主席在逻辑上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因信已很长了，我不再详细举例说明了。

总之，林副主席的这个指示，使人产生这样的概念：这是全面贬低和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列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一个文件。尽管林副主席也用了不少“马列主义”的字眼，但仔细一看，他的“马列主义”实质上就是指毛泽东思想，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全盘代替马列主义。

附带提一下，目前人们对您的著作有许多不适当的说法，举一例子，《解放军报》《五论突出政治》中说：“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照办”，我认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您老人家的思想。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表面上看来，这是“完全无异议地”（您的话）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可是事实上它正违背了您和列宁的教导。列宁说：“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老人家也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列宁的话和您的话说得多么中肯和深刻呀，现在就有这样的现象，如列宁批评荷兰和德国的“左派”时说的，某些人对革命事业，对您老人家也“像熊那样帮这种倒忙”。

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反映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作僵化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您的话）。当前思想界比较混乱，象林副主席的某些言论也是混乱的，我担心林副主席的某些言论，尤其是最近的这个“讲话”中的某些说法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混乱，这就是我给您老人家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说一点对红卫兵的认识。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主观的（更确切地说，是您老人家创造的）一股强大的尖兵队。它是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最有力最合适最能发挥威力的武器。红卫兵的出现，这是斗争策略上的胜利，红卫兵的首要任务就是一斗二批三改。我认为，红卫兵的第二个任务应该是彻底的自我改造。这样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防止在我国出现修正主义。长征步行串联，这是自我改造的一种好形式，（这和我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您的信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一个建议对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几点建议——寄伯达同志转的——中提出的“让他（她）们（指干部子女）滚一身泥土，沾一身垃圾，流一身臭汗”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串联中有游山玩水的，也有走马观花的。革别人的命是痛快的，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据我所了解（当然，这是极小的一点了解），红卫兵的自我革命精神还相当差。我认为，如果中央和您老人家把这件事提到一定的高度上来，并加以强调，这将

会大大促使红卫兵的自我革命。

敬爱的主席，我就写这一点，这是我给您人家的第四封信，第一封信写于一九六一年，由于社会上某些现象的刺激和政治上的敏感，我对部分党政机关和干部提出了极大的怀疑，现在看来，这种怀疑是容许的，而且，我的怀疑是符合现实的，但在当时，我就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同时，不可讳言，由于受某些现象的迷惑，由于政治水平低，我对党也产生了怀疑。这就是那封信的主要错误。由于有顾虑，所以那封信就未寄去。您老人家是否有看到过去的信，这是我最挂念的事。虽然我写的都是平常事，而且又写得不好，但里面是我对您老人家无限信赖的心。我这些举动，尤其是这封信，也许要被某些人看作是犯罪的，是反党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但是，我不怕有这些罪名。革命，在被革的人看来，就是犯罪的，革命者就是以这种“犯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斗争内容。我们的革命先辈，如果没有这种犯罪的勇气和精神，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也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的和世界的伟大革命导师您老人家。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事与愿背，由于种种原因，革命的动机导致反革命的行为，这也是可能的。革命就难免会犯些错误，怕，就不会有革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进步。

去年三月我给您老人家的信中表示：我担心中国的革命事业会葬送在几条“蛀虫”和几个“火盗”的手里，葬送在“败家子”（即干部子女）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显然捉住了几条“蛀虫”和“火盗”，并且致力于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这使我非常兴奋。但是，我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还是十分担忧的，我担心苏联的悲剧会在我国重演，就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不过，我但愿自己的担忧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最后，我衷心祝贺您老人家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战争二十七年。祝身体健康！

人民的儿子、您的卫兵      胡全林      1966年11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